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二期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2b)

【当事者言】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施义之
【人物春秋】	陶铸在一九六六	赵庚
【史海钩沉】	“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江青摄影史	杨银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言】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 施之义 •

◇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公安部出席九大的代表是张其瑞（原劳改局政治处的干部，九大会议结束后仍回干校）。在九大会议上，李震、于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24日九大结束，接着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震和于桑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于桑提出要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就回干校去了。李震回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安部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1967年1月夺权后，就割断了同各省、市公安局、局的业务联系，同北京市公安局也如此。因此各业务组实际没有什么业务工作。治安组就决定作调查研究，组织了七八个干部，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蹲点。

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进行备战。李震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国务院决定：各部委都要一分为二，公安部一部分留北京城里坚持工作，一部分到京郊西南山区备战。领导小组成员留北京的是谢富治、李震、曾威，我和赵登程到山区。我们在部内检查了原有的防空设施，等待着在国务院统一安排下去看地形。后来此事搁置下来，地形也没去看。

同时，为了战备要疏散犯人，赵登程专程到湖北、湖南、陕西勘察犯人疏散地点。回来后，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把北京的犯人疏散到陕西，放在没有开工的国防工厂里，写了报告报送国务院，当时没有批，后来也搁置下来了。

◇ 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九大后，全国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正常工作也开始恢复。1970年春节后，于桑结束了干校劳动回部工作。接着，原副部长刘复之也从干校回来复职。还陆续回来一批原公安部的干部。

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公安部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决定恢复公安部在全国的业务工作，恢复同各省、市公安部门的业务联系，筹备召开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过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文革五年以来没有开过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准备会议文件，组织一批干部到各省、市调查了解当前公安工作的情况。

领导小组决定由李震、刘复之、陆石（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朱万林（军队支左干部，原某师政委）、我等十余人到上海、湖南、武汉等地进行调查了解。李震因工作走不开，我们先走。

这次南下，暂时摆脱了复杂的政务纷争，大家的心情都比较轻松。我们先到上海，住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附近的大沪饭店。同来的北方同志对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倒马桶的吆喝声，及此起彼伏的刷马桶声很新奇，我对这些比较熟悉，回想起12岁时因家境贫寒到上海学徒就是先从倒马桶开始的。这一带过去是旧社会的红灯区，外表热闹，实际上周围房屋破旧，居住拥挤。我很久没到上海来了，解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也从一个童工成为革命干部，可这里的市井生活依旧。

我们在上海听取公安各部门的汇报，了解了一般治安情况。

6月，因公安部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和刘复之被部里召回。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李震，副主任有于桑、曾威、赵登程、刘复之和我。委员有张其瑞等。同时取消领导小组成立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副组长于桑、曾威，成员是所有的革委会副主任及张其瑞。张其瑞1970年初从干校回部工作，任部办公室负责人。

会后，李震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到了8月，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通知李震去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后面的调查李震就没有参加。

我们调查组从上海、杭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朱万林等人去武汉，我和刘复之等人去了长沙，再到武汉会合。我们所到之处，均是听取当地公安部门军管负责人汇报，诸如文革中揭发出哪些问题，造反派联合情况，当前社会治安、消防、交通等方面的情况。在汇报中也谈到对文革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一般在听完汇报后我们在发言中都讲一些鼓励的话。只有浙江省的汇报中强调十七年公安工作

没有成绩，是特情专政。理由以萧山县为例，认为萧山县的公安干警多数是原国民党特务争取过来的特情人员，以及被解放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对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全面否定。因此在他们汇报后要我们讲话时，我没有表态。请刘复之讲话，他也不愿意讲。汇报中各地对公安部门掺上军队支左干部都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掺沙子。刘复之也一再说：掺沙子是必要的，不是一把一把地掺，应该一筐一筐地掺。

调查小组于国庆节前回京。国庆节后就着手起草第十五次公安会议文件。文件起草由刘复之负责，有陆石、朱万林等同志参加。文件起草了两个月，起草中对一些敏感问题也有分歧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处理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防止逼供信、扩大化等六对矛盾，文件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后上报周总理。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1970年11月开始至1971年春节后结束，会议时间较长。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负责同志，大部分是军队的军管干部（多数是副军职的军事干部）和少量的原各公安厅老公安干部。会议由李震主持，中央直接领导（此时谢富治已患癌症住院），汪东兴、纪登奎经常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中反映强烈的问题有：一、文革以来公安部迟迟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恢复正常联系，不抓业务；二、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三、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有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意见最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

讨论中我向李震建议：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可以表态。李震说，这话我不能说，把问题提出来，请周总理说。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进行总结。周总理从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经验讲起，肯定了十七年公安工作的成绩，批评了浙江提出的十七年是特情专政的错误论点。也说到当前在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事情也难免。同时周总理批评了公安部迟迟不恢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业务工作关系，说：文革初期不联系业务工作是对的，现在还不恢复业务联系是最大的失职。周总理在讲话中同意我们起草的文件中提出的公安工作六对矛盾，说要处理好这些矛盾。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后，公安部恢复了正常的业务工作。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组织机构作了调整，设立了侦破、治安、边防、劳改、政工等组及办公室。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了一些原局级干部，如陆石、马剑等，与军队支左干部，按军、干、群原则配备了各组的领导班子。部核心小组的分工是：李震负责全面工作；于桑负责侦破组；曾威负责三办、劳改组；刘复之负责办公室、边防组；我负责政工组、治安组，赵登程按中央决定去青海国防二一厂蹲点。

◇ 1971—1974年去固原地区平反

1971年9月14日，李震在核心小组会上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乘飞机外逃叛国，发现后，有人主张把飞机打下来，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吧。”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大家都非常震惊，事前都不知情，谁也没想到党的第二号人物，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走到叛党叛国这一步。

国庆节后的一天，大家正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此事，李震带来了国务院指示。李震说：“农

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在讨论谁去时，李震说他想去但走不开，我就说：“我去。”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包括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1953年，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曾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故又称西海固地区。后调整为五个县，称固原地区，有时仍称西海固地区。该地区1.6万平方公里，人口98万，其中回族占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97%，是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71年11月，我带了十几名干部，有军队支左干部吴泮才（原某师政委），有老公安干部甘重斗（原内务办副主任）、张文柄（原政治部训练部长）、杨满才、许妙道、李景雨等同志。我们从北京出发到银川，部分同志是从笔架山干校出发到银川的。

到了银川，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这时宁夏保卫部和银川市公安局已派人下去了，我们主要是配合他们调查研究进行平反。经研究，调查的重点定在西吉、海原，以西吉县夏寨公社车路沟为中心。我们分两个组，我在的一组住车路沟大队，另一组在车路沟附近。

二十一军当时驻陕、甘、宁，军部在宝鸡。军里从安全考虑，要派一个警卫排来，被我谢绝了。我要军里派几个医务人员，带些药品，也带上武器。这样晚上站岗，白天有小病也可以治疗，还可以为群众治病，同时自己起伙，一得几便。我们就住在车路沟生产大队的院子里。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困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一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了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群众中主要是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普遍的病是疥疮、蛔虫，不少孩子闹蛔虫大肚子。有病没处治，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两个大夫，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随我们调查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在生产上看到的情况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农业生产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经济作物（固原地区过去种过胡麻，胡麻油可以外销），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生产工具落后，还是牛拉或是人拉的木犁。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在领导上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

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现在都没了。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团结，脱离了群众。还有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解放后十七年中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而又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解放已经20多年，人民群众还是那么贫困？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不是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蹲点调查，主要调查了解这八次叛乱的情况，想尽快进行平反，落实政策，体现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同时，也了解其他方面情况。这一年固原地区产粮仅26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47元（这是后来从统计局了解到的数字）。

我们在固原地区过了1972年新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正在包饺子，部里来电话要我回京。一方面要我汇报固原地区调查的情况，一方面因谢富治病重。我回京时，谢富治已经不能讲话，对他说话也没有反应了。

回部后，我向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李震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我叫去，沉重地对我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错误。”他当即批示对西海固地区进行救济，问我救济面有多大。我了解越到山沟深处群众越困难，估计约70%需要救济。周总理决定拿出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按70%的需求发出救济。后来群众穿上了救济的军服。大家开玩笑地说：西海固出来的老百姓都是拉练的（指拉练的军队）。周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我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在汇报平反工作，谈到我们正在对八次叛乱的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全部平反算了。”

按周总理指示，1972年1月24日到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固原地区的负责同志，地区所属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宁夏来的同志表示：1971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自治区党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宁夏的问题是党的政策落实不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特别是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必须纠正。但是半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有效地解决，这次召集我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开会，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提高认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要认真开好这次会议，拿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思想：认为回族“落后”，在工作中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造成了民族关系紧张化；在处理叛乱案件上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被欺骗裹胁进去的基本群众也当作敌人，把大批家属当作匪属，给少数敌人以可乘之机，利用我们的错误煽动叛乱，进行破坏活动。再有农业生产落后，农田基本建设搞的很少，乱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很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满腔热忱对待少数民族事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对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纠正，凡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平反。对策划和组织叛乱分子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根据认罪态度区别

对待。会上也明确了平反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把党的民族政策和肃反政策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落实政策。

会议还研究了如何促进生产，要求国家支援什么。县里的干部提出要解放牌汽车、手扶拖拉机、电磨等等。我同杨立功同志的意见是，按当前地区生产情况，首先应该解决草籽、树种，从种草种树、养牛养羊抓起，增加生产，改善生态平衡（其实小块耕地用不上拖拉机，村里当时又都没有电，电磨一时用不上）。为各县解决了草籽树种，但县里并不太欢迎。后来胡启立同志任西吉县委副书记时，曾找过我，要我再帮助搞些草籽、树种，是我同农林部沙风同志联系后解决的。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会后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毛主席、党中央。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了中发（1972）22号文件，发至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将这个报告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做了通报，肯定了两个报告的精神。

会后各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除了原来进行试点调查的230多人的宣传队搞了15个试点，领导蹲点取得经验外，地县两级又组织了760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平叛扩大化比较严重的133个大队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

会议开罢，正准备再赴固原地区时，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又发生了叛乱，这是全国解放以来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串联陕西省陇县，甘肃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11个公社的150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我和杨立功去，告诉我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对峙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要我们立即去平叛。并对我说，你是二十一军出来的，二十一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到西安，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就在塬上用石灰画了一个圈，作为临时机场。我们下飞机后在驻军六十三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了。

我们到达隆德县，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和县委领导都在。当时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的，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传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一二百人上了山。

隆德县领导当即组织了一个民兵营第二天拂晓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等到天明，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没抓到。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了生产。这次平叛双方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13人，伤12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13人，伤十余人。

3日，开了一天县常委会，杨立功同志和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我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后派二十一军的一个连在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镇住叛匪，稳定了民心。

3月6日，我建议到发生叛乱的现场去看看。我同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由于山高、沟深、路窄，许多地方汽车行驶困难，只能步行。我们到中岔大队，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地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我们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然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却发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她说两三口。怎么两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疑点更大。我要同志们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看到一个窑洞上了锁，要她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子，掀开被子、炕席，露出一个炕洞。我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妇女答：“没有。”我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带刺刀的枪。我想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喊话。经过喊话，下面先送出了枪，然后出来了一位公社革委会委员，原来这是他的家。问他话他支支吾吾，后来供出大依玛穆也在里面。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案犯交县保卫处处理。

我们立即向广大群众宣告大依玛穆已被抓住，宣布凡参加叛乱的人只要向政府自首便不予追究，要群众安心生产。我们先后到被叛乱分子杀害的干部、群众家里看望慰问。为尽快弄清案情，自治区的一名领导干部同地区保卫部干部和隆德县的干部一起，组织宣传队到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向群众交代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追捕漏网的重要案犯。叛乱平息了，民心也安定下来。

这次叛乱，对落实中央召开的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来了新的困难。很多党员干部对平反工作另有看法，有的干部说“2·29”事件的发生，说明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镇反”，甚至认为“现在搞平反是站在敌人一边”，把平反与镇反对立起来。我们从党的民族政策、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讲起，经过多次谈话、讨论，做这些干部的思想工作，多数干部的思想有了转变。我们要求地区各级领导在处理叛乱事件中认真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认真落实民族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打破敌人妄图煽动群众干扰我们部署的阴谋。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和感情用事，不能随便抓人，已抓的人凡属上当受骗者，经教育后放回让其投入生产；除对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外，对对方死伤人员也要妥善处理。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为落实座谈会精神铺平了道路。

1972年3月13日到17日，为了总结这次平叛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固原地区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党委和五个县的县委书记、保卫处长及参加蹲点的宣传队长等，有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所有成员，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领导成员张怀礼、蓝天民等。

对于“2·29”叛乱事件的总结，大家认识到，由于过去违反民族政策和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掩护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敌人早在去年六、七月就开始串联活动，事件发生前两天即2月27日，他们杀鸡宰羊，制作凶器，四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的竟纠集二三十人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我们由于群众基础薄弱，严重脱离群众，对此毫无察觉。有的干部平时麻木不仁，叛乱发生后又惊慌失措，因此对纠正扩大化错误发生动摇。这次叛乱事件能迅速平息没有蔓延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党的政策的威力，中央及时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派出医疗队，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赢得了群众的心。敌人也感到末日到来，迫不及待地策动叛乱，他们手持斧头威胁群众“你们想抹帽子吗（指平反），想抹帽子就别要脑袋”，以此同政府较量，破坏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平息叛乱过程中，由于宣传并执行了党的政策，严格甄别敌我，坚持“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只要回家生产者不予追究，争取了群众，及时逮捕了躲藏在窑洞里的首恶分子，迫使骨干分子投案自首，瓦解了敌人的阴

谋，很快扭转了局面。

会上学习讨论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检查了落实报告的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先进点上的经验。

经过摸底，初步掌握了全地区平叛扩大化涉及86个公社，516个大队，1756个生产队，17198人。全区抽调了26名各级书记、常委，6名处、室负责人和766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到133个大队开展工作。以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大力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讨论平反名单再上报批准，卸掉了群众的思想包袱。宣传队在工作中抓住并着重解决领导上严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纠正了要回民养猪的错误决定。使各级干部认识到宗教信仰的历史延续性；认识到群众的宗教信仰、习俗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认识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回、汉族之间的团结，自觉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整个国家安定团结的保证。

会上强调在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要求不失时机地进行春耕生产，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

会后，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向中央书面汇报了关于平息隆德叛乱事件和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

杨立功同志返回北京，我送他到西安。我离开西安还没有回到西吉我们蹲点的村子，部里又来电话要我回去。回京第二天，谢富治病逝，我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又立即回到固原地区。在查明情况后，我配合当地领导到有关生产大队进行平反，宣布历次叛乱被迫胁从的群众和所谓“叛属”无罪，恢复他们的名誉。

1972年7月，调查小组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北京。

半年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对隆德叛乱事件的处理意见报告了中央，华国锋转给我看了。报告中提出要枪毙7人，有糟占林，有杀死乡干部的叛匪，还有那个革委会委员。我向华国锋建议不要枪毙那个革委会委员，能教育过来的人不一定枪毙。以后是怎样决定的，我就知道了。

◇ 关于“算旧账”的争论

1970年11月至1971年春节，公安部继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后，召开了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调整健全了组织机构，部分干部从干校回部工作，恢复了因文革而停顿了多年的业务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按中共中央通知学习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公安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我在固原地区平反期间回京两次，断断续续参加过几次会议，知道一些情况。

“批林整风”运动中，在核心小组会上于桑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

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问题。另外，对于“伪党”一案向赵登程、李震、曾威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

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李震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核心小组内部自己统一思想，然后写个报告报送国务院。纪登奎和周总理的指示在核心小组扩大会上作了传达。于是，部里一部分干部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了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

1972年2月，赵登程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拘留审查。这时李震任核心小组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成员有刘复之、黄庆熙、张其瑞和我。黄庆熙接管了第三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 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1972年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汇报总结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1973年的工作纲要。座谈会开始后，李先念、纪登奎召集部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座谈会方向。在会上纪登奎说：“我看了座谈会会议简报，又有人提出‘砸烂公检法’问题，当时哪个省市委、哪个党委不是当作黑党委被砸烂的？还要砸烂你的狗头呢。我批评你们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还是留有余地的。不要扭着不放了，否则对今后的工作没有好处。”李先念说，“‘算旧账’名义上炮口是对着林彪，实际上炮弹落在群众头上”，并要李震、于桑、曾威、刘复之在会上各自作自我批评。

按常规两年开一次公安工作会议，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开后已有两年了。经中央批准，将此次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改为第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始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除纪登奎、李先念参加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参加了最后的总结大会。总结是纪登奎做的。总结的内容主要是以批评“算旧账”来统一思想。会上李震作了对部里出现不利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算旧账”承担责任的检讨，其他人没有发言。

第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后，我患淋巴结核，长期低烧不退，基本半休，只参加核心小组会，负责一些治安方面的业务工作。看到部里干部从上到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一，并且很难统一，看到李震部长工作上十分为难，自己工作也不好做，这时听说中央要派人去西吉县任县委书记，我想去西吉县，能摆脱公安部繁杂纷乱的环境，我又对西吉县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很愿意到那里好好干一场。和妻子商量，妻子怕我身体吃不消，劝我治好病再说。不久，胡启立被中央委派到西吉县。

◇ 公安部整顿

周总理在李震死后指示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同时指示清理公安部大院。公安部在发动群众配合破案工作的同时，结合批林批孔运动批“算旧账”的思想，进行了思想整顿。

1974年春节后，华国锋指示我们：“你们过去发生了‘算旧账’，对下面起了不好的影响，这次结合批林批孔，要带个好头。”还说“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不要表态”。

在批林批孔过程中部内反复批判了刘复之、于桑为代表的“算旧账”思想，还联系批判了刘坚夫等几位局长。清理大院的要求是，要把被审查干部的家搬出去，但因为无处可搬，困难很大。结果只有少数几家搬出，大多数没有动。

关起门来整顿一年后，华国锋批准进行组织机构整顿。华国锋参加了核心小组的研究，指示说：“健全组织机构要按精简原则，人数仍按谢富治传达的毛主席指示，不能超过450人，设哪些机构你们讨论。”还指示：“各局领导班子必须是战斗性强的，不要有安置性干部。干部按老、中、青，军、干、群搭配。”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恢复一局、二局、三局（原三局、七局合并）、边防局、劳改局，以及政治部、办公室，后来又增加了民警局。各局下设几个处，各处人数和人选名单由各局党支部按华国锋指示精神提出建议，交核心小组讨论，核心小组讨论后再下放各局党支部讨论。这样上下结合，反复多次才决定最后的名单上报华国锋，华国锋同意后再报国务院批准。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的一批局级干部，如刘坚夫、丁兆甲、石广平、侯西斌、陆石、姚伦、马剑等同志任局级领导。按中央指示精神，局、处级干部里安排了一些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的年轻干部，当时全国都是按老中青组织各级领导班子，造反派年轻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是很普遍的现象。

精简下来的干部，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哪个省、市需要人，动员他们自愿去，也可以经组织介绍去。在“五·七”干校期间，新疆、宁夏、陕西等地曾来公安部要过干部，有部分干部被介绍去。后来人民日报社、北京市等单位也陆续要去了一些干部。到1976年，还有一部分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

公安部健全了局、处机构，安排了干部后，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刘冰清、张牧还专门来公安部总结经验。

1974年，中央决定杨奇清、严佑民、凌云从专案一办转来三办结案后，回部工作。杨奇清住院治疗，恢复一切待遇，未安排工作。严佑民、凌云任公安部副部长，参加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我、于桑、黄庆熙、杨贵、祝家耀、严佑民、凌云、张其瑞。曾威有病，不久回部队。我们的分工是：我负责常务工作，于桑、祝家耀管一局（侦察局）、四局（边防局），杨贵、严佑民管二局（经济保卫局）、三局（治安局），凌云、张其瑞管办公室、五局（劳改预审局）、六局（民警局），黄庆熙、祝家耀分管政治部，黄庆熙负责专案三办。

1973年尹肇之从沙洋干校（1972年中苏形势紧张，笔架山干校有一部分到湖北沙洋，称沙洋干校）回京。1974年组织整顿后，中央决定调他到政法干校工作，任该校负责人。

◇ 李洪枢案

1972年秋，新疆边防部队巡逻时在国境线我方一侧发现刚吃过丢弃的食品空罐，报公安部。公安部即向新疆、甘肃、陕西以及全国各省市公安部门通报此情况，要各地的旅馆、饭店、交通站口注意盘查从苏联潜入的间谍。

不久，在吉林长春的一个小旅馆内查到一名叫李洪枢的人，经审问，李是黑龙江人，30岁左右，原是小学教员，1967年偷越国境到了苏联，1970年到莫斯科，在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接受了特务训练，1972年6月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回国。据李洪枢交代，他到过北京，已同苏联大使馆联系过两次，联系的方法是在某街道的电线杆上做记号，联系上后去的长春。查清李的基本情况，此人由长春市公安局送交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一局负责，决定经教育后逆用。

李洪枢由北京市公安局拘押后，在我们掌握下同苏联使馆进行联系，在第二次联系时，我们通过夜视仪观测到苏联使馆来了人，证实了李洪枢的交代。

接着李洪枢在我方安排下用密写的方法提出要克格勃发给电台，苏方答应给予。电台放在香山附近，埋在地下，做上标志，李在我们监控下去取。取时挖出一个水泥匣子，打开一看是电台，还有人民币1000元。这架电台在当时比较先进，预先把声音录在录音带上，只要一按电钮就发出了。

这期间曾因看管不严，让李洪枢跑了，李震为此批评了北京市公安局。李洪枢跑到了郊区，不敢进村子，偷挖老乡的地瓜吃，被老乡发现扭送了回来。

1974年1月15日晚，吴忠要我去卫戍区，到了大会议室，吴忠告诉我中央决定逮捕李洪枢，也就是停止逆用。逮捕前要李洪枢同苏联大使馆联系，在西坝河桥下接头。吴忠、我、市局副局长王更应率领换了便衣带着棍子的民警在西坝河周围埋伏，王更应埋伏在桥附近，我和吴忠在西坝河东头的小木工房内指挥。听到汽车声音后不久，王更应用夜视仪观察并向我们报告已接上头，这时便衣立即围上去，人赃俱获。缴获了一台快速收发报小型电台、密写的指示信以及密写显影药、伪造空白边境通行证、活动经费等。当场还扣住一辆汽车，里面有苏联使馆一等秘书等五人，一起带到公安局，后将使馆的人放走。1974年1月19日这几个人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

这件事当时公开进行了报道，揭露了苏联使馆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

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过，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北边珍宝岛边防的胜利；南边抓住苏修特务的胜利。

□ 《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

## 【人物春秋】

陶铸在一九六六

• 赵 庚 •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3年至1937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抗战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认为，陶铸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长期在地方工作，与刘少奇、邓小平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陶铸敢讲话，用他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以贯彻自己的思想。

陶铸履新后，毛泽东把许多重要权力交给了他。他分管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出版总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同时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不但分管的范围广，权力大，而且分管的部门，多为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波及的文化、教育、理论、宣传部门。

1966年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4日抵京后，便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性格的政治环境，身不由己地被推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陶铸进京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配发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于是，全国各地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就掀起以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状态。

在中共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严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还正在全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中央便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协助学校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然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康生以及“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等人却主张不派工作组，认为派工作组只能支持右派。对此，双方僵持不下。在这个问题上，陶铸是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认为派工作组对正确引导运动有利。毛泽东的本意是不赞成派工作组，见陶铸也主张派工作组，便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陶铸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们认为，陶铸一到中央就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是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后来，众所周知，派工作组的问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大罪状”。

1966年6月下旬之后的一段时间，北京一些高校屡屡发生了工作组与造反的学生之间的冲突，江青、陈伯达、康生则趁机在学生中进行挑拨，并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而在如何看待和处理工作组和学生对立的这些事件的问题上，陶铸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观点保持一致。陶铸还指示他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写一篇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认为陶铸这是和刘、邓一起镇压学生。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陶铸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同时又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的顾问。陶铸这个“顾问”，实际地位和权力都大于其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的陈伯达。“中央文革”是负责指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枢，而这场运动的重点恰恰都是陶铸所分管的部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明显下降，尤其是刘少奇从中央的

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在这种情势下，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上的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一定要设法补上。新华社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即把邓小平的头部移到了陈毅的身段上。不久，这次“换头术事件”即见诸传单、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此攻击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紧接着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的问题上，陶铸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陶铸并不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但他认为此举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陶铸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了两篇这方面的社论。他的这种做法遭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

毛泽东是坚决支持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光是学生搞不行。他曾对“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讲，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他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仅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陶铸坚持那样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 二

1966年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动1000余名成员集体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结果被困于上海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王洪文等便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列车，造成沪宁线堵塞断交长达31个多小时。王洪文等这样做，是企图扩大事态，迫使中央妥协，以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发生在文革初期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处理这件事。周恩来、陶铸的意见，是动员赴京的“工总司”人员回上海，就地闹革命。陈伯达开始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是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已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于11月11日深夜奉命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工总司5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不然火车就不能通，他们就不肯回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和张春桥争执起来，曹打电话给陶铸，请示怎么办。陶铸明确表示：仍然要按照周总理、我、陈伯达3人先前定的意见办。

陈伯达却耍了滑头，跟江青一道让张春桥在“工总司”的5条要求上签了字。对此，陶铸与陈伯达、江青一直争执到毛泽东那里。

第二天，即11月14日，毛泽东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范围的参加者有“中央文革”成员和军队的几个负责人，但常委中没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宪法念了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明显是针对陶铸的，因为陶铸说过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当然，这也是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陶铸只得作检讨。

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毛泽东叫陈伯达、王力搞的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在这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王力等人指责和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只得再次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陶铸还检讨自己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联。他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进而表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由陶铸直接指导的工交座谈会开得很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还搞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样，在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就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中去了。

1967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具体和直接针对的就是陶铸。据当时社论起草人回忆，毛泽东说：“我对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

### 三

王任重原是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很得毛泽东的赏识，成立“中央文革”时被任命为副组长。在陶铸上调中央工作后，中央任命王任重接替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但仍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之后不久，就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对立。因此，江青等人在“中央文革”内部排挤王任重。王心情不好，加上工作繁重，肝病复发，天天发低烧，便要求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去广州养病。对江青专横跋扈极为不满乃至当面顶撞的陶铸同情王任重，同意王的请求。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江青等人操纵下成立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派”突然向陶铸提出了“强烈要求”，要求他必须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如果不接见，就不走。陶铸只好答应接见他们。

12月30日接见时，这帮造反派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被陶铸断然拒绝。双方大吵起来，造反派们动手要揪陶铸，陶铸的警卫员就走进会场保护陶铸，于是，造反派们便一口咬定说陶

铸动用军队镇压群众。江青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条“罪状”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镇压群众是原则性的错误，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青等人下决心非要打倒陶铸不可。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前几天刚与陶铸吵了架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的代表时，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问题端出来，搞突然袭击。于是，陈伯达就对这帮造反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联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又变本加厉！你们到中南局去，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小组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还背着中央。”陈伯达进一步煽动，“你们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是给我们的支持。”

在接见现场，“中央文革”那几个大员，一个劲地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把造反队员的劲儿鼓得足足的。当晚，就传出了陈伯达等人讲话的“爆炸性新闻”。

接见之后，造反派们当夜就兵分三路：一路聚集北京的红卫兵，跑到中南海围墙外面，用高音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声音震天动地；一路则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散发“打倒陶铸”的传单，说陶铸“执行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中央内部最大的保皇派”等等；一夜间，全北京都知道要打倒陶铸了；另一路人马则急急往全国各主要城市发送电文，让各地的造反派都起来打倒陶铸。于是不到两日，全国各地就都掀起了打倒陶铸的狂潮。

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镇压群众。陶铸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还说：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讲话之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趁机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是，原来喊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其实陶铸并不是1967年1月8日毛泽东讲话后才被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中旬就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此时距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擢升为中央第四把手才只有4个月。

陶铸夫人曾志（1911—1998）看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8日的讲话记录稿后说：“我不相信主席说陶铸‘不老实’，是不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见《陶铸传》，郑笑枫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毛泽东这样做是什么意思，非常难解，这也许是反问曾志：“……你说呢？”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老战友，在井冈山曾志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陶铸和曾志唯一的女儿陶斯亮在2012年4月3日给阎长贵（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

后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的信中，却认可毛泽东说陶铸“不老实”这件事，她说：“……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

现在来看，如果那时被认为“老实”“可靠”，就成了文革的干将和打手了。

#### 四

毛泽东在1967年1月8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实际是批准了陈伯达、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而到2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的这种行为。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又批评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开一个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可是毛泽东又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

许多关注文革历史的人，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在“打倒陶铸”这一问题上，两次（1967年1月8日、2月10日）讲话相互矛盾。其实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是个假命题。不论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讲，还是从实际运作讲，一个“五号人物”打倒（而且是突然袭击）一个“四号人物”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文革这种极端不正常、极端扭曲的政治环境中，“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公开宣布打倒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不过是“中央文革”百分之一的错误，或许只是时间地点、方法程度问题。否则，为什么不在批评陈伯达、江青时，顺势为陶铸“正名”，让陶铸出来继续工作呢？

“打倒陶铸”是文革中一桩重大冤案，“四人帮”首恶的江青和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以及“党内大奸”康生，是直接的参与者、迫害者。毛泽东则偏信了江青等人对陶铸的诬陷。毫无疑问，在“打倒陶铸”这一过程中，江青等人是不折不扣的干将和急先锋。陶铸这样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不经过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也没有下达中央文件，就被蛮横地打倒了。文革之乱相，可见一斑。

从1967年1月8日起，陶铸被停止了一切工作。此后，造反派经常拉他出去批斗，陶铸备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次在批斗时，头上被造反派一拳打了一个肿血泡，回家后他愤慨地对夫人曾志说：“老子要是不相信共产主义，就跟他们拼了！”

1968年陶铸患上了胆囊癌，1969年10月被强令疏散到合肥，同年11月30日在合肥孤独地去世，死后遗体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处理。陶铸在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明志：我没有反对毛主席。

陶铸正直刚烈，嫉恶如仇，脾气大得很，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散文《松树风格》长期入选中学课本，教育了几代人。陶铸诗作也好，其1969年所作《赠曾志》二首中的“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已成为名句，广为流传。

□ 原载《文史精华》2013年第8期

~~~~~

【史海钩沉】

“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江青摄影史

• 杨银禄 •

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爱好广泛，爱动植物、爱打兵乓球、爱打扑克、爱看电影、爱骑马，尤其爱好摄影。我想说说她在学习摄影活动中的一些故事，供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

◇ 名师指点，悟性颇高

江青的摄影指导老师，据我了解有吴印咸、石少华、徐大刚等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

吴印咸是我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生于1900年，卒于1994年，享年94岁。1938年9月，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吴印咸是这个团的技术及摄影负责人。那时候，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举办了摄影训练班，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江青听过他讲课，从此认识了吴印咸。可以说吴印咸是江青摄影的启蒙老师。

1970至1972年，江青对拍摄人像着了迷，先后在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设了照相室，邀请吴印咸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指导拍摄。那时，她把许多中央领导人请到钓鱼台10号楼或17号楼照过相，其中有周总理、李先念、纪登奎、许世友、谭启龙、谢富治、林彪、叶群、李德生、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江青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照过相。

石少华，1918年生，卒于1998年。他从事摄影工作半个世纪，多次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并曾荣获国际大奖。江青1961年从庐山回到北京，决定再次拜师学艺，请石少华当她的指导老师。石少华对她怪僻的个性早有耳闻，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江青把她的真实心思报告了毛主席。还是毛主席出面，将石少华请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说：“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学生吧。江青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还是毛主席的面子大，石少华同意收这个徒弟了。他给江青的第一课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石老师的建议，经常到天安门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拍摄。后来，石少华给江青调整了拍摄主题，让她多拍些花草树木、庭院建筑等静物风景，重点掌握层次感，注意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等。

江青这个人还是比较聪明的，很有悟性，做事专心认真，很快就喜欢上了拍摄风光、静物，像日出、日落，还有湖面月亮倒影等。

1964年国庆节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江青还向时任总理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虚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摄出焰火的最好效果。杜修贤毫无保留地指导她。结果，当晚她拍摄的焰火效果很不错。我见过几张，确实是繁花似锦、光彩夺目。

徐大刚，1926年生，2012年去世。他多年从事摄影工作，被称为“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1960年被调到中南海，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1961年7月要上庐山开会，由于主席历来不想坐飞机，因此徐大刚和江青一同乘专机前往庐山。飞机上，两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摄影。当聊到如何在摄影过程中抓住动态物体的瞬间摄像时，徐大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江青如何运用快门速度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如何拍摄高速物体，如何使用闪光灯等。江青听得津津有味。直到飞机在九江平稳降落，江青才止住询问。

上了庐山之后，江青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摄风景照，并拿给徐看，让他提意见。一天下午，徐大刚正在休息，江青派人来叫他，让他陪着去仙人洞拍照。仙人洞是悬崖绝壁上的天生石洞，洞深约3丈，相传是吕洞宾修仙成佛的地方。那天，徐大刚和江青等人游玩，从山洞出来，走到洞口时，突然看到夕阳初现，远处山壁上的衔碑亭别有一番风姿。江青特别兴奋，立即询问拍摄方法。徐大刚说：“拍摄这种照片，一定要运用动静对比的方法，方能显出意境的效果。拍摄时，照相机不能有丝毫晃动，否则会造成被摄的晚霞呈模糊现象。”还说：“选择快门宜慢不宜快，速度过快会使原先呈动态的晚霞‘凝住’而丧失动感，还应注意陪衬物，尽量加大活动幅度，做到晚霞不动，影像背景模糊，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徐大刚将随身带的两架照相机设置好，让江青从镜头里看整个晚霞映衬的衔碑亭情景。江青在画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会有的图案。她还叫随行警卫拔掉杂草，砍掉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江青一直等到在画面上看到一缕缕的云雾从远处飘来时，才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几天后，江青拿着冲洗出来的照片，笑逐颜开。从画面上看，不仅酷似大自然，更兼具常人无法揣摩的意境。于是，她把它称为习作，兴致勃勃地拿给毛主席欣赏，并请主席提出批评意见。起初，毛主席可能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也可能是看了没有想好，一直没有回音。江青等得很着急。两周后，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幅“仙人洞”照片的意境，表示对这张照片很满意。他还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诗兴，为此，1961年9月9日，欣然题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拿着这首诗，细细地欣赏和品味，乐得合不拢嘴。以后这张照片连同这首诗，成了她炫耀的资本。

◇ 刻苦练习，几近痴迷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江青在摄影艺术上取得一定成绩，除了名师指点以外，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开。

我给她当秘书时，一天清晨，她在钓鱼台10号楼门前摆弄照相机，准备拍摄盛开的牡丹花。我看她情绪不错，就试着小声问：“江青同志，您喜欢照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是在延安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前线的部队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架旧照相机，交给了主席，主席叫我试一试，看还能不能用，主席、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时候，在行军的路上，我用这架照相机还给主席照了好几张照片呢。解放战争胜利后，我把那架旧照相机交公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嘛。”

江青对摄影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1971年春天，她为了拍几朵牡丹，不辞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等当时种植牡丹的地方，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为了拍出晶莹剔透的露珠，她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去了。去后，她精心地挑选花开得最大的，颜色最好的，花瓣层次最丰富的，选好后，她亲自或用手沾上水，挥洒在花朵和叶片上，或用口含上水往花、叶上喷洒。然后，支好三角架，安好相机，对好焦距，调好速度，就开始等阳光、等蜜蜂、等蝴蝶，有时候等半个小时，有时候等一两个小时。江青是个急性子的人，有时急得满头是汗。但是，拍照时她很耐心。有一次，她对摄影师们说：“北京的春秋季节，色彩丰富。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大胆地用逆光，我喜欢用侧逆光、顶逆光，用辅助光，要耐心地等，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等到有阳光了，水珠晶亮了，蜜蜂、蝴蝶开始飞舞了，她才放心满意地按下快门。

江青为了在钓鱼台拍一张“月夜哨兵”的照片，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卫局二处挑选“模特”，精心选中了警卫参谋王进良同志。他身体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精明强健。然后，她又到处挑景点，选中了钓鱼台17号楼南侧一棵繁茂苍劲的大松树旁。选中了人，选好了景，就开始等了。等月亮圆，等天气好。所谓天气好，就是无云雾，无风尘，空气爽，温度宜。一天晚上，

月亮又大又圆，天空干净如水，无风无尘。江青叫人搬去了照明灯具，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才充满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门。

她为了拍一张满意的“高度警惕”的备战照片，叫一位警卫战士潜伏在一个隐蔽处，手持钢枪，睁大眼睛，聚精会神，目视前方。为了拍摄清楚战士锐利、警惕、有神的大眼睛，一向十分讲究卫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后是跪在地上，最后趴在地上拍摄，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

1970年11月，她在海南岛休息，为了拍照鱼雷快艇后边的浪花，在快艇高速行驶时，她不顾颠簸及海风吹打，站在甲板的木凳上，由四个人扶着不停地拍摄。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最近一两年，我从新华社拿的胶卷，冲洗的小样，放大的照片，还没有交钱，你去新华社找石少华，请他帮助我算算欠他们多少钱，我一次性还给他们，欠人家的钱老是还不了，心里不安。”一周后，石少华送来了一张单子，成本费用一共3000多元。江青一看这么多钱发愁了，于是向毛主席要了3000元的稿费，才还了钱。1970年代初，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交了钱以后，江青怀疑石少华敲她的竹杠。有一天，她对叶群说：“石少华不地道，敲竹杠，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费用，不少呀！”叶群劝她：“我给您在画报上、报纸上多登几张照片，收点稿费，弥补一下。”

1972年暑期，江青到北戴河避暑，为拍摄日出，连续四五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出来爬上联峰山，选好位置，还要等到霞光出现才开拍，一直拍到太阳露点、露边、露脸、海天一色才收场。如果有点儿云雾，遮挡了太阳，她便收拾器材，无精打采地离开，等到下次再去。

1973年6月11日，我离开她之前，亲眼看见她自建国以来所拍摄的底片和小样装满三四个大木箱。

◇ 孤芳自赏，影展梦碎

毛主席说，江青没有自知之明，就是批评她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毛主席批评得很对，切中要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思想作风上，也表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上。

1972年夏，美国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维特克夫人（比江青小24岁）来我国访问。江青在接见她时说：“近几年我拍的照片一万张左右，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我对照相是有研究的，也称得上半个专家吧。我是时常发表作品的，当然不是用真名发表，不然又不得了。他们还要为我搞影展，我不要。”江青说的“他们”，一个是指叶群，另一个指姚文元。

1973年9月，毛主席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江青把在京的新闻记者叫到钓鱼台审查新闻纪录片样片，片长只有三四分钟。看完片子，江青对那些摄影师们说：“你们，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翻来覆去老样子呀！”还给他们放了一场英国的《花园》，江青指指点点地说：“人家变化多端，讲究色彩，推、拉、移、摇，活得很啦。你们呢，眼界不广，技术又不全面。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

江青到处赠送她的得意之作。她送给维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仙人洞”照，将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体写上毛主席的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落款“江青摄”。另一张是江青在庐山拍摄的“汉阳峰”照片，在大照片的背面题写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

尔露峥嵘。”落款“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时，兴高采烈地送给日本剧团领队清水正夫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张著名的“仙人洞”照片，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三个字“江青摄”。这一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舞剧团，人们目瞪口呆后，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

江青从开始喜欢摄影，到热衷于摄影，又发展成利用摄影扩大她的政治影响，即从生活爱好逐步发展到想成名、成家，甚至为成为领袖人物捞取政治资本。1970年至1972年，她的摄影范围几乎遍及各个领域，作品包括林彪的读书照《孜孜不倦》，备战照《月夜哨兵》《高度警惕》，工作照《聚精会神》等，登上了《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等刊物。江青从自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一百多张，准备展出，展出地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一切准备就绪，为了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进一步扩大影响，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请示主席同意不同意举办这个影展。一天后，徐秘书回电话：“主席说‘习作可以，搞影展不可’。”还叫她立即取消这个计划。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江青又一次萌动了影展的念头，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从大寨回到北京，江青又张罗她的正式影展，还想了个主意——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结果，毛主席知道后，仍然是两个字：“不行！”至此，江青的影展梦彻底破灭了。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别的什么企图，有的人喜欢肉麻地吹捧别人，有的则喜欢被别人吹捧。这一吹一听满足了虚荣心。

1971年6月8日，叶群代表林彪到钓鱼台10号楼看望江青。不知为什么，那天江青很高兴，主动热情地与叶群握手，并拿出她认为拍得最好的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摆在大条案上让叶群欣赏。叶群认真地欣赏着每一幅照片，看了一会儿便说：“江青同志既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是一个无产阶级艺术家。”她夸奖说：“江青同志给这位小护士照得多么美呀！漂亮、丰满、皮肤白皙细润、姿态优美，您把一个少女的线条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灯光用得恰到好处，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叫人羡慕呀！江青同志照的花卉，颜色逼真，绚丽多彩，露水欲滴，好似闻到了花的芳香，就是专业摄影家看到您的这些作品也会赞不绝口，嫉妒几分。江青同志以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境界、一流艺术家的技术，照出了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杰作呀！”

6月9日，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下到钓鱼台照相。林彪有怕水的毛病，平时很少洗澡、洗脸。那天来照相，竟然连胡子都没刮。江青、叶群两位女人耐心劝说林彪刮掉胡子再照相。林彪虽不情愿，但看在江青的面子和诚恳的态度上，总算同意了。林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问我有没有刮脸刀，我说有，并立即拿给他。

林彪刮完脸，就跟着江青、叶群从10号楼走到17号楼江青的摄影室。林手中捧的《毛泽东选集》，是在江青的坚持下，叫我跑回10号楼临时拿的我的书。为了照这张相，平日怕光、怕风、怕冷、怕热的林彪任凭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

当拿到冲洗放大的照片后，江青又找来姚文元、叶群一起研究发表事宜。姚文元吹捧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您们看怎么样？”

江青听完之后沾沾自喜地说：“好，我同意，就用这个标题。但是，作者不能用我的真名实

姓。如果用我的真名实姓，又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呢！就用‘高山’或用‘峻岭’，还是用‘峻岭’这个笔名吧。”姚文元和叶群异口同声地说：“好，用‘峻岭’好。”叶群表态说：“感谢江青同志的辛苦劳动，我现在就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他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来电话：“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照片，林彪同志看到了，他非常高兴，他说：‘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不但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了不起。’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 “谢富治遗像”一语成谶

自中共九大以后，江青在她的摄影室里拍了不少人物像。江青认为照得最好、最满意的是给谢富治照的那张。因为谢富治和江青比较熟悉，江青用心照，谢富治不紧张，很放松，很自然，照片面容表情好、光线好。江青经过认真剪裁，请石少华放大到有半张《人民日报》大小，洗出一幅彩色照片。江青拿到大照片，端详着，欣赏着，并叫我打电话让谢富治到钓鱼台来。

谢富治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赶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江青递给他那张得意之作，洋洋自得地问：“富治同志，你看，我给你照的这张照片如何？满意不满意？”谢富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赞不绝口地说：“好，照得实在是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又是江青同志给我照的，太宝贵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从不开玩笑的江青说：“我同意，你回去就跟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说，到时候别叫她给你用错了。”谢富治满面笑容地说：“一定，一定。我这就回去告诉她，她记性好，不会用错的，她办什么事都很认真，请您放心好了。”

有些事，无巧不成书。谢富治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不久，就觉得肚子里不太舒服，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患了不治之症，半年以后的1972年3月26日，就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公安部礼堂举行，遗像果真是用江青照的那张彩色照片。在周总理致悼词时，江青眼含泪水，还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所照的那一张一语成谶的“遗照”。

◇ 毛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些什么名堂？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革”色彩，像墙上挂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所取代。根据周总理指示，在尼克松住的18号楼挂上13幅清朝的古画。过了两年，1974年10月间，江青突然挑选自己拍摄的13张花卉照片取代了国画挂在18号楼的主厅里。但这些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是毛主席发出了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有什么权力可以摘下国画，挂上你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江青大哭起来，走出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还在哭。

回到钓鱼台她把摄影作品摘下来，堆放在一起焚烧了。笔者对此事有详细记述（《江青为何焚烧自己的得意之作》，原载2012年第5期《同舟共进》），此处不赘。她想在国外客人面前展示她的作品，说明她对自己的摄影颇有自信的。那么别人怎么看待她的摄影技术？

◇ 江青的摄影技术究竟怎样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姚文元、叶群、谢富治等人夸江青的摄影艺术，他们

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因为他们没什么理论根基和艺术根据，仅凭感觉。只有专家、业内人士才能真正地说出个一二三来。

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老资格摄影家杜修贤看过江青不少摄影作品，称她拍摄的手法比较巧妙。有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取出一张周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杜修贤看，说这是江青照的，问他照得怎么样？这是杜修贤第一次见江青的摄影作品，觉得用光很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主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总理和邓大姐也有同感。后来，杜修贤说：“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2011年1月25日，《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转载了一篇文章，《江青“御用摄影师”李文化的悲欢史》，作者是张欢、印青。文章指出，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大师李文化，直到今天，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样用光，逆光、测光、侧逆光、顶逆光、正面光。她说，拍人物大胆用逆光，很少用顺光，因为顺光层次感、立体感不强，比较平。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要求的一样。

2013年5月26日下午，原中南海专职摄影师吕厚民对我说：“江青对摄影艺术还是懂一些的，她照的照片总的说可以。练习摄影好多年了，进步不慢。”他还说：“江青曾是演员，对镜头不陌生，她知道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

红墙专职摄影师、新华社高级记者钱嗣杰对我说：“别的不论，只论江青摄影这一点，江青照的照片很不错，选景、构思、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剪裁也很不错……江青照的照片都是由她个人剪裁的，我发现几乎每张照片剪裁得都恰到好处，这很不简单。她当过演员，见多识广，心灵手巧。”

江青拍摄好的底片，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送到新华社摄影部去冲洗，取回小样。我多次看到江青摘掉近视眼镜，伏案仔细地剪裁，累得、急得满头大汗。

2013年5月26日上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舒世俊告诉我：“江青对摄影艺术，懂，很懂，照得很不错，有一定造诣。原因有三，一是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就是一名电影演员、明星。那时摄影师就时时给她摄像、拍剧照，她从老摄影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术；二是1961年9月9日，毛主席给她在庐山‘仙人洞’照题了诗，极大地鼓舞了她学习摄影的热情……三是她对她拍摄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一丝不苟，从不凑合。”

舒世俊讲得很对。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会前，江青把一批文艺界工作者召到大寨，准备安排山西省文联主席马烽和广州军区作家张永枚写一部红军长征的新电影。有一天，江青在花椒树旁要给马烽等人照相。马烽后来回忆说：“江青让我站在一个地方，她用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看了看，让我往旁边移动了半步，说这个地方好。工作人员把带三角架的照相机架好了，接着她把测光表在我的脸上晃了晃说，他的脸色重，需要补光，不然没有立体感。工作人员立即从手提箱里拿出了充电照明灯，向我照射。江青说不行，需要站高点。但山上既无梯子，又无凳子，就叫《山西日报》社摄影记者骑到马上去打光。江青一连照了两张。后来，她给凡是调来大寨的作家、导演、演员都照了单人照，说要把它们都放大，送给主席看。后来，她送给了每人一张集体照、一张单人照，都是彩色的。”1976年，马烽把照片挂在他家的墙上。“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告状，拿江青给他照相的事做文章。后来，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才搞清楚了。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家

里。马烽认为：回忆录，应当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这就是马烽坚守的做人底线。

我在《博客天下》2013年第15期上看到周琼媛的文章《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文章说：“5月10日，华辰2013年春季拍卖会影像专场几乎满座，约200人到场，至少有20位藏家为这张照片而来……这张《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照片里，毛泽东穿着中山装，坐在藤椅上。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眉头微蹙，双目微闭。他身后，山峦层层叠叠；他脚下，草木繁茂招摇。这是1961年夏天，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这张照片估价是3到5万，卖价比估价高了10倍多。”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照片，无疑是江青拍摄的一一因为江青曾亲自送给我一张同样的照片。

1971年的一天，江青拿着一张毛主席的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是我1961年在庐山含鄱口给主席照的，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主席也很喜欢。你送到新华社请石少华同志给我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洗10张，送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觉得江青亲自给主席照的照片要送给我们，很高兴，很快就放大取回来了。江青立刻用粗红蓝铅笔红色一头在大照片背面写上了“请杨银禄同志惠存。江青某年某月某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与江青划清界线，我把江青的字彻底刮擦干净，只剩下那张毛主席的照片了。现在看来不应该那样做，那是历史嘛。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 原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